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 究 集 刊

YAN JIU JI KAN

1

1986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专辑

(二)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九八六年六月

本期责任编辑:

谢本书、龙永行、牛鸿宾

研究集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总第二十四期)

目 录

- 谢本书著《龙云传》序言.....黎 澍 (1)
龙云与昆明的民主运动.....谢本书 (4)
- 李、闻惨案四十周年.....刘克光 (34)
近代云南文化述略.....夏光辅 (50)
评杜文秀“服毒乞降”说.....蒋中礼 (77)
论驻粤滇军.....孙代兴 (96)
陈荣昌述略.....荆德新 (115)
- 论中越历史上的宗藩问题
——兼驳河内史家的种种谬说.....龙永行 (129)
论基诺族起义的特点和意义.....王 军 (184)
- 曲靖地区方志纂修概述.....杨名镜 (200)
南诏事迹年表.....赵鸿昌 (221)
护国起义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牛鸿宾 (256)
- 后记..... (269)

谢本书著《龙云传》序言

黎澍

我在一九六一年主编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教育部用为大学史学概论教材。大概是一九六三年夏天，我收到云南大学助教谢本书寄来的一卷油印稿。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史学概论的讲稿，大体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的顺序，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的有关论述，加上说明编辑而成的。本来不相属的摘录的段落，经过一编，居然连贯起来了。我认为这个年轻人有本事，还没见第二个人做过这工作。当时我和宁可、李时岳、胡绳武正在合作编写史学概论教材。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听说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就通知调他来参加我们的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精力旺盛，思想灵活。可惜中间插上其他工作，史学概论的编写只得半途搁下，未能把当时参加工作的几位同志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但是，北京之行，对谢本书的影响可能很大。据说他从此研究历史。发表论文近百篇、专著近十种。近年来特别侧重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护国运动史》、《蔡锷传》、《唐继尧评传》等多种。为了写作这些书，他做了许多调查，由于各方面的支持，了解了许多事实。这个方法很好，较之个人坐在书室里讨生活，可以使历史更有真实感。他的新作《龙云传》就是一个例子。

龙云祖籍四川凉山，出生于云南昭通，彝族。一九一二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一九一四年有个法国拳师在昆明摆擂台。龙云见他耀武扬威，神气活现，登台几个回合，把他打翻在地。这事引起了云南将军唐继尧的注意，不久就任命龙云为滇飞军大队长（即警卫部队大队长）。龙云从此发迹。十多年后，取唐继尧而代之，成了独霸一方的军政首脑，还参加拦截长征过境的红军，一度得到国民党蒋介石的欣赏。因为滇军和红军交战，是使双方互相削弱的好办法。蒋介石感到正中下怀。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本来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第一次西迁武汉，再次西迁重庆。蒋介石随时准备收拾西南各省的地方势力。龙云处境困难。他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从拥蒋到反蒋，从反共到联共。抗战时期昆明民主动运的活跃，与龙云的这种转变是密切相关的。这当然为蒋介石所不能容忍。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刚结束，就在云南发动政变，把龙云软禁了起来。幸而后来脱险到了香港，公开宣布反蒋，并在一九五〇年来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许多政治活动。后来龙云回忆说：“从昆明到北京的漫长之路，也就是我与蒋介石彻底决裂，逐步走向人民之路。”（《团结报》一九八〇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一九八四年纪念龙云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讲话，高度评价了龙云对爱国民主运动的贡献，认为他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

《龙云传》作者根据大量调查材料，记述了龙云的一生事迹，特别着重他后半生的转变，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辛亥革命以后，乘时崛起、割据一方的人很多。龙云的经历说明一个人因为偶然机会而置身高位，如果只为自己打算，不能为人民做

些有益的活动，那就不值什么。龙云把他自己同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正是他不同于许多同时代人的所在。《龙云传》的意义无疑也在这里。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注：谢本书同志新著《龙云传》，应四川民族出版社之约，已完成初稿十八万字。我国著名史学家黎澍同志在百忙中为之写序。这里先将序文发表。

龙云与昆明的民主运动

谢本书

王昆仑、楚图南先生在怀念龙云的文章中说：“抗战期间，昆明一度成为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是同龙云先生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①抗日战争后期，昆明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胜利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群众艰苦奋斗所取得的结果；然而，作为地方实力派龙云的转变，及其对民主运动所起的保护和 support 作用，也不能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一九四五年底在昆明爆发的“一二·一”运动，是抗战后期昆明民主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昆明作为“民主堡垒”的重要体现。“一二·一”爆发及其以后连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龙云虽然被迫离开了云南，而他的影响却仍然存在。程思远先生回忆说：“龙云先生离开云南以后，昆明高级知识分子失去了政治上的保护力量，于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得以公开摧残民主人士和进步力量。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先后被害，人们不免想起：如果龙云先生不离开昆明，此种事也许不会有。”^②这个推测，并非没有根据。

让我们先从抗日战争时期昆明民主运动的发展说起。

一 抗日战争时期昆明的民主运动

自一九一一年辛亥以来，云南的民主空气，一直比较浓

厚。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的反袁护国战争，是云南各族人民民主精神的大发扬。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昆明人民响应“五四”掀起的民主斗争，对云南以后历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昆明建立了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特别委员会”，积极推动云南民主运动的发展。一九二七年推倒滇系军阀唐继尧统治的“二六”政变，是云南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成果。随后，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了，民主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云南地下党遭到了破坏，民主运动暂时消沉。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红军长征过云南，播下了红色的革命种子。在红军长征过云南的影响下，一九三五年底，云南地下党组织恢复并重建，先后建立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共昆明支部（不久，两个组织合并成立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重新领导开展云南的民主运动。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侵略，民族矛盾上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中共中央号召“建立广泛的革命民族统一战线”，随后颁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全民族总动员，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云南省工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了一系列的救亡抗日活动。抗日的救亡群众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建立起来，“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抗先”）、“云南学生救国联合会”（“学联”）等公开和秘密的抗日组织，成为宣传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救亡》、《火山》、《南方》等救亡刊物，相继出版，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救亡歌咏团体的推动下，《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救亡歌曲，广泛流行，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云南各界都成立了公开的“抗敌后援会”，青年学生们也成立了“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大批爱国师生和爱国人士聚集昆明，带来了北方三个著名大学的学术自由、求实精神和民主学风等优良作风，也带来了“五·四”、“一二·九”爱国民主运动的革命传统，使抗日救亡运动更加蓬勃高涨。《云南日报》在我党的影响下，不断刊登“新华社”的消息，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甚至刊登毛泽东的著作《论新阶段》等。《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民主周刊》等报刊，在云南公开发行。昆明逐渐地形成大后方的抗日民主堡垒。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先后派出三个军二十多万人，支援全国抗战，作出了英勇的牺牲。滇西军民在抗击日寇侵占领滇西国土的斗争中，更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九四〇年底到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最高当局制造了“皖南事变”后，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为了避免革命势力遭到不必要的损失，有计划地把一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转移到边疆各县，把民主革命的种子撒播到全省各地。云南地下党组织认真贯彻了“长期埋伏，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总方针，并且执行了中共南方局提出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具体任务，把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扎扎实实。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在旦夕，留居香港的各界名流无法离港，而孔祥熙却包了民航飞机，运送洋狗和家具。消息传来，激起了青年学生的满腔愤怒，他们贴出了“打倒孔祥熙”的标语，并举行了游行示威，喊出了“争取民主自由”、“打倒囤积居奇的孔祥熙”的口号。这是皖南

事变后，昆明地区爆发的第一次具有民主气息的示威游行。这次“倒孔运动”虽然来得突然，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却成了昆明民主运动重新恢复和高涨的预兆。被誉为民主教授的吴晗，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算媲美。过去的学生运动是虎头蛇尾，我希望这次是虎头而不蛇尾。”^③这表明被压抑的知识分子强烈不满的情绪开始迸发了出来。

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在一九四三年派华岗（化名林少侯）、周新民、李文宜等先后到云南工作，帮助民盟建立地方组织，开展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和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华岗等人来云南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指导和帮助昆明的民主运动。”^④民盟云南地方组织的建立，并在昆明发展了大批上层知识分子入盟，如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潘大逵、罗隆基、李公朴、唐筱蓂、夏康农等。在这前后，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和“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等进步组织建立，对促进昆明的民主运动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九四四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为了挽救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不利形势，急谋打通中国大陆上的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从河南一直退到贵州。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挽救抗战危机的办法，要国民党改弦更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我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争取民主的新高潮。这一年的昆明“五四”纪念活动，成了昆明民主运动新的高涨的起点。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傍晚，由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决定，联大历史学会举办的“五四”座谈会，在联大的一个教室里举行。座谈会由李晓主持，张奚若、闻一多、吴晗、周炳琳等教授出席了会议，教室里挤满了人，连窗台和窗外都站满了人。张奚若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也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他在发言中，把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进行比较，说：“辛亥革命所完成的工作只是表面的，因此是一个不彻底的未完成的革命，但是五四运动就不同了，这是一个社会的革命。五四之后，我们的文化思想习惯才革新起来。”可惜，五四时期的要求今天尚未达到，我们这些过来人很惭愧，所以今天再来和大家共同努力。^⑤吴晗发言指出：“五四运动是为本要打破一个牢笼，打破一种束缚，那种束缚是打破了。然而在今天我们又面对着一一种新的牢笼与束缚。”^⑥闻一多也在会上发言表示，“我愿意和你们联合起来”，再次提出“五四”要科学，要民主的口号。^⑦接着，许多青年学生纷纷发言，要求以实际行动争取民主。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十二时。这次座谈会重新点燃了昆明民主运动的火炬。

“五四”这一天清晨，在联大的校园里呈现出一片热烈的节日气氛，一夜之间，民主墙上贴了三十多张壁报，晚上还举行了营火晚会。一九四四年“五四”，被联大学生称为“民主精神复兴的一天。”^⑧

“五四”座谈会后，地下党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于昆明地区又举行了三次较大的政治活动，第一次是七月七日，举行抗日战争七周年的时事报告晚会。报告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听众有昆明各界群众两千多人，其中有教授十人参加了会议。吴晗、闻一多等知名人士在会上发了言，分别从政治、经

济、文化各方面剖析了国民党抗战以来的政策。闻一多的发言问道：“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有人怕青年‘闹事’，我倒以为闹闹何妨！”^⑨这个报告会比“五四”座谈会的旗帜更为鲜明，它是“皖南事变”以后，昆明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讨论政治问题的集会，是民主力量的一次大会师。

第二次是十月十日，在昆明省立昆华女中举行了双十节形势讲演会，参加会议的达五千多人。闻一多、李公朴等主持了大会，发言者一致主张反对独裁，反对投降，要求民主、团结，要求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保卫祖国，保卫大西南。大会宣言指出：“今天不但是民族史上空前的危机，而且是中华民族生命史上空前的危机，外则强寇深入，二十余省土地沦于敌手，三亿以上人民变为奴隶。内则政专于一党，权操于一人。人心涣散，举国沸腾；三十三年前祖先苦心缔造的民国，到今天国既不成国家，民更不是主人，瞻顾前途，不寒而栗！”宣言要求“切实保障人民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立即释放汉奸以外的政治犯，立即彻底改善财政及经济政策。停止通货膨胀，以便减轻平民的痛苦。”^⑩

第三次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了纪念护国起义的大会，在云南大学操场上聚集了六千多人。会议通过的宣言说：“保障抗战胜利唯一的方法还是民主政治。”宣言提出的具体方案是：“（一）结束一党专政；（二）召集人民代表会议；（三）组织联合政府。”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吴晗、闻一多等进步教授走在游行队伍里，高喊着：“我们要——民主！”“我们要扩大民主运动！”^⑪

进入一九四五年，昆明的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了。这一年

的“五四”纪念活动，进行了七天。五月四日的大会和游行队伍，从几千人发展到两万多人，真是盛况空前。这几天，西南联大的校园特别活跃，昆明市各界人民兴高彩烈来到联大，他们说：“到联大过节去！”“这比过年都高兴都快乐！”“五四”大游行及其纪念活动是抗战时期昆明民主力量的一次大检阅。“五四”纪念大会还有一项重大收获，是通过成立了昆明学生界的统一组织——“昆明学生联合会”，促进了学生运动的深入发展。

一九四五年“七·七”纪念日，地下党通过“民青”为骨干，由学生组织出面举行了纪念大会。大会发表了《昆明各大中学主办抗战八周年纪念大会通电》。通电响应了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号召，提出了“废除一党专政”，“制止内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成独立自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大会所进行的宣传鼓动，为“一二·一”运动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战争胜利后，人们希望重建家园，希望胜利能带来和平和幸福，要求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

然而，蒋介石政府却倒行逆施，抢夺胜利果实的同时，把屠刀指向了解放区和革命人民，对地方实力派也不放过。于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使用阴谋手段，强行改组了云南省政府。这就是龙云所说的，蒋介石所进行的“小偷式政变”。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被迫离开了云南。在这种情况下，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的发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它是昆明民主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 抗日战争时期龙云对昆明民主运动的支持和保护

龙云（1884—1962），字志舟，彝族，云南昭通炎山人。他出生在彝族统治等级黑彝纳吉家族中，幼年丧父，流落金沙江两岸，学会了一套拳术，成了当地著名的武术爱好者。辛亥革命时期，他投入了滇军，开始他后来飞黄腾达的旅程。由于他武术高强，曾击败法国著名大力士（拳师），而引起云南都督唐继尧的重视。龙云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不久，就成了唐继尧身边的贴心侍从。几年之间，龙云变成了唐继尧警卫军的首脑——钦飞军大队长。一九二二年，龙云护送唐继尧“二次回滇”后，即担任了显赫的滇军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驻扎昆明，成为滇军中仅次于唐继尧的实权人物。

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发动了“二六”政变，把已堕落为滇系军阀头子的唐继尧赶下了台。接着，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三支军队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军阀混战，最后以龙云的胜利而结束。龙云成了云南的土皇帝，控制着云南的军政大权。龙云统治云南的初期，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尽力攀结蒋介石，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曾屠杀了一些共产党人。

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法西斯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和蒋介石的排斥异己，使龙云在新形势面前不得不作出新的选择。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激发了龙云的抗日热情。八月，龙云去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期间，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志见面，受到巨大的启发和教育。他一方面答应云南派兵二十万，支援全

国抗战；另方面又与朱德同志交换了电报密码，与延安建立了秘密联系。^⑫这对龙云后来的转变起了重大的作用。龙云曾在南京表示：“我此次进京之目的，不仅符合你们请缨抗日之志，亦代表云南一千三百万民众表达爱国护国之赤诚及愿将全部人力物力贡献中央，决心为国家民族神圣抗战奋斗牺牲到底。”^⑬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滇军出师，英勇抗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好评。朱德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给龙云的一封信中，对滇军出师抗战，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说：“抗战军兴，滇省输送二十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在将来抗战中，在争取最后的搏斗中，云南将肩负更大责任，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根据地。”^⑭龙云的这种转变，大大刺激了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加强了对西南实力派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日军逼近武汉，我党长江局于十月由武汉撤至重庆，改名南方局。南方局是我党中央在国统区的派驻机关，直接实现党中央对国统区人民抗战的领导。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包括争取地方实力派在内，坚持把抗战进行到底，是南方局的主要任务。云南地方实力派的首领龙云，当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争取的重要对象。

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向龙云提出十条建议：“一、坚持团结抗日，才能得到各方面支持，对国家作出贡献。二、与川康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合作，互相支援。三、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互相配合。四、与社会民主爱国人士多接近，帮助解决其困难，争取支持。五、对中央军进驻云南要加以限制防范，如杜聿明部在昆明防守司令部，其醉翁之意是明显的。六、蒋介石

把中央特务和宪兵十三团派到云南，主要是对龙，要限制其活动。七、要搞好社会秩序，明文规定昆明治安由宪警维持，其他任何机关不得在市区搜查、捕人。八、增强地方军事实力，改进军人政治工作。九、独立自主办好地方经济。十、支持办好地方性、进步性报纸”。^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军统特务头子康泽到滇，要龙云拿办地下中共党员，龙说‘拿出证据来，我可以办。’结果康泽拿不出证据，就不敢深求。中央派人要龙云镇压学生运动，龙云说：‘学生都是好学爱国的，借事生端的是极少数，他们闹事，是因为政府有些事未办妥，他们有意见，只要政府改善，他们会听话的。有些人无事找事，学生说几句话要跟究，教授讲学也干涉，结果越压越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其伤实多。’有些人不听我的话乱来，以后闹出事来，我就不管’。使中央来人无话可说。”联大教授张奚若给蒋介石的公开信说：“贤与能者之莫能为用，其造因若何？亟宜从速猛省。”龙云看到后说：“张对蒋，骂得好。”^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反共浪潮又在全国泛滥。接着，昆明又发生了反对孔祥熙的“倒孔运动”；蒋介石对于云南情况甚为不安，乃派特务头子刘健群到昆明压迫龙云限制我党活动。这时的龙云为了应付蒋介石，“采取中立立场；他口头上反共，但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什么认真措施。我党争取龙云主要通过三条渠道：一是通过倾向进步的龙云部属张冲的关系，这在一九四〇年就开始了。二是通过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刘震寰，他当时是龙云的顾问。三是通过杨竹庵、廖品行、刘耀阳和一位姓李的参议长等人。他们主要是劝说龙云打击蒋介石派遣的特务，抵制蒋介石挤进云南，促使龙云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